

時評

盡快引入外勞 鞏固復蘇基礎

本港勞動力存在不足之窘，乃是鐵一般事實，許多行業急如熱鍋螞蟻；其中，由於本地勞工供不應求，輸入外勞已經不可迴避。昨日，政府便公布了各界期待多時的應對勞工短缺問題方案，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是在保障本地工人利益的大原則下有限度輸入勞工。的確，實事求是解決問題，而非坐視問題不顧，才可鞏固復蘇基礎，改善民生困難。

假如勞工供應充裕，當然不假外求；然而，受累出生人口持續減少，疫情更令勞動短缺問題更加尖銳，無論基於短期抑或長期考慮，香港都有必要增加輸入外勞。比較60年代初，每年出生人數超過10萬，80年代末與90年代末則分別跌至7萬和5萬左右，過去兩年更銳減至3萬水平。若然單靠本地供應，毋須水晶球已可預知，勞動人口勢必不斷萎縮——事實上，「80後」、「90後」，以至「00後」已成箇中重災區，30至34歲年齡層的勞動人口有43.6萬，25至29歲則僅37萬，15至24歲更只有17萬，相較10年前三者數字則為50.3萬、46.3萬和32.2萬，即分別少了13%、20%甚至47%之譜，不難看出未來將再惡化。疫下3年且令問題雪上加霜，期內勞動人口自高位累減近22萬，個別行業如航空業的流失更見嚴峻；以國泰為例，疫前員工有12萬，疫情期間銳降到4萬至5萬，儘管近期加強招聘，也只能恢復到6萬至7萬，即僅及此前一半左右。另外，人口老化也嚴重打擊那些較難吸納新血的工種，例如建造業即使人工變得可觀，人手不足問題長年以來均沒顯著改善，另外小巴司機、洗碗工等亦如是。有見及此，單靠本地勞動力包括訴諸加薪，又能否有效解決數量不足之困？何況加薪會推高成本，就似美歐現在的高通脹正由勞動市場緊張所致；當下香港的人力成本已經不低，由工程費用的增加，到外來用膳愈來愈貴，多少皆因羊毛出自羊身上。

新的輸入外勞方案設計周全，力求趨利避害，一方面有利紓緩人手緊張，另一方面又設法保障本地勞工利益。首先，針對人手供求矛盾最大的建造業和運輸業，可以分別引入1.2萬和8000名外勞，即只相當於兩者最新就業人口約4%，對本地勞動市場的負面衝擊可謂微乎其微，而且每輸入一名外勞還規定聘用兩名本地工人。措施亦確保了本地勞工的競爭力，一來輸入外勞的工資不可低於相關職位的工資中位數，外勞如須留宿租金更由僱主承擔，即日往返的機場外勞亦須僱主負責交通費；故此，如非本地招聘困難實無太大外聘誘因，難言是為廉價勞工另闢蹊徑。再者，外勞亦不虞額外擠壓本地住屋資源，因規定只能居於工地宿舍，或由元朗社區隔離設施改建的中央宿舍。當局並強調，會續以培養和增加本地勞工為主，包括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工作等，外勞只屬輔助性和非永久性措施。

為確保經濟社會持續發展，香港必須盡快擺脫人手不足掣肘。新輸入勞工計劃最快下月接受申請，當局預計可於兩個月內完成審批。事不宜遲，招聘困難的行業誠宜馬上開始籌謀招聘工作，用好外勞政策突破樽頸向前邁進！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星

工總訪京成果豐碩 團結業界共謀發展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查毅超

商界心聲

在本月初，筆者與梁君彥議員在內的多名香港工業總會（工總）高層代表，訪問了北京四天，期間有幸獲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夏寶龍主任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去年，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期間夏主任參與陪同，今年夏主任再到香港考察六天，此行訪京是筆者兩年內第三次與夏主任見面，深切體會到夏主任對香港的關心，對香港社會、經濟及創科產業發展的重視，讓工總同仁倍感振奮。

會面期間，夏主任充分肯定香港工業總會為特區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國家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作出的貢獻，鼓勵工總堅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繼續在維護香港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做強創新科技產業、引領青年成長成才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對於夏寶龍主任給予工總的肯定和鼓勵，筆者與工總同仁感到欣喜和鼓舞之餘，亦深感任重道遠。香港的再工業化和創科發展之路雖充滿挑戰，卻非能一蹴而就。推動香港工業數碼轉型和智能生產，

需克服人才、技術和資金方面的挑戰。在創科的發展上，香港在基礎科研上實力毋庸置疑，而大灣區其他城市在生產力上具備優勢，香港如何鞏固中游，加強研發成果產業化的能力，與整個大灣區優勢互補，是成功與否的關鍵。工總將致力聯繫創科生態圈的各持份者，促成更多合作，為香港創科產業和再工業化發展共同努力。同時，筆者鼓勵業界掌握國家在創科、工業及經濟發展等方面的最新政策，推進與大灣區的產業優勢相結合，實現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工商界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

此行工總高層訪京團還有幸拜會了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劉賜貴、科學技術部副部長張廣軍、商務部副部長郭婷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亞平等，並就多項重要議題進行深入交流，取得豐碩成果。其中，工總就香港包裝食品進入內地爭取設立綠色通道，有關建議獲得商務部鼎力支持，工總相信簡化清關程序可使港商擴大市場，並助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受新冠疫情影響，工總上一次組團訪京已是2018年。隨着內地全面復常，工總在短時間內能夠成行舉辦訪京之旅，特別要感謝中聯辦協調部朱文部長及其團隊參與籌備工作，幫忙聯繫內地不同的部委與訪問團會面，並與工總秘書處緊密合作。此行訪京，不禁讓筆者回想香港近年面對的一一挑戰，感慨萬分。幸而在國家及特區政府領導下，香港先後實施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戰勝新冠疫情，帶領香港「由亂到治」，開啓「由治及興」的新篇章。

今年是後疫情的關鍵一年，香港經濟復蘇的勢頭在通關後不斷加強加快，工商界對國家及香港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筆者深信，工業界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同時是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一環。工總必定與業界攜手，配合特區政府政策，增強香港經濟發展動能，並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有優勢下，帶領業界把握歷史性機遇，將業務做強做優做大，在大灣區建設下擔當「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平台角色，為推動國家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須重視市民對治安的憂慮

民建聯副主席 陳克勤

建評

本港有一支優秀的警隊致力維持治安，確保社會安穩，使香港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和穩定的城市，讓港人感到自豪。然而，近期發生數字轟動全港的兇殺案，社會因而瀰漫着焦慮氛圍，亦間接影響市民心情。就此，筆者期望當局必須密切留意市民對本港治安變化的憂慮，加強維護治安的工作，全力打擊罪行，穩定民心，維護社會秩序。

對於社會治安予人惡化的觀感，筆者認為或與經濟不景有關，即使本港已全面通關和失業率偏低，惟不少人仍處於低收入狀態，加上港人於疫情期間飽受精神壓力，以至罪案增多之餘，案件涉及的暴力程度亦越趨嚴重。就此，警方在防止及偵破罪案和保障市民

生命財產方面，其實一直做得相當成功，偵破不少罪案。然而，由於罪案涉及相熟或認識的人所為之餘，亦有隨機犯案的因素在內，故在市民眼中，即使相信警方的執法能力，惟隨機犯案的無常性，誰都有可能成為不幸的受害者，從而讓市民產生不安和憂慮；此外，不少罪案在廣受社會關注之下，會造成漣漪效應，引發其他模仿行為，對外產生更廣泛的負面影響。故此，特區政府無論是從照顧普羅市民的需要，或嚴厲打擊罪行的態度，都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筆者認為，為了防止罪行，警方除了加強巡邏，加強阻嚇性，有效防止暴力罪案的發生之外，更可在罪案發生之際，及時提供警力支援，令市民看到場面受到控制，從而發

揮安定民心的效應。另一方面，警隊過去因應人手調配，部分警區取消了警員落地巡邏，改以警車巡邏，筆者明白警隊每次的調配工作都有深思熟慮，惟落地巡邏的好處是讓警員能更深入了解該區的情況及環境，以及居民和外來人口在該區的流動模式，故無論是讓警員接收情報、察覺異常狀態，以至即時到達罪案現場等方面，都甚有幫助。因此，警隊應當重視落地巡邏在打擊罪行政策中的重要性。此外，「天眼」在防止罪案和調查案件方面亦是十分有用的輔助工具，天眼除可防範對犯案心存僥幸的人士，不少罪案亦是憑天眼輔助破案。故此，警隊宜考慮在合適的地區加設天眼，再配合警隊的各項綜合手段，從而提升防止及打擊罪案工作的整體成效。

日本倒核廢水入海貽害無窮

鄭赤琰

名家指點

國際法定義下的「侵略」是在一個國家主權範圍外做出危害他國人民的行動。一般的「侵略」行為是派軍隊入侵他國，任意殺害他國人民，掠奪他國資源。以國際法的定義來論，日本這次把危害極大的核廢水倒入漂流向全球的海洋，無論公海或私海都無法避免受害。這樣的舉動，正是一種「侵略」的行為，因為事前日本已經深知傾倒核廢水入海將會危害整個海洋。日本也深知這樣做是超出自己主權之外，此舉將導致全球的沿海國家所擁有的200海里海洋領土受核污染而無法利用其海洋進行經濟開發，尤其是海產經濟，都會受到嚴重損害。這麼說來，日本這種無視他國主權利益的侵犯行為，正是十足的「侵略」行為。

也許日本會為自己辯解，它這麼做，自己並沒得到好處，沒沒佔他國的好處，也沒掠奪他國資源的意圖。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因為一般的「侵略」到頭來都是害人害己，有破壞無建設，像二戰時日本企圖侵略中國，到頭來不僅自食其果，也令到中國深受戰爭之苦，這正是「侵略」行為導致的「雙輸」後果。而這次

核廢水事件，日本的行為正是在搞破壞，毫無建設可言，是十足的「侵略」行為。

就國家主權而論，「公海」屬於全球共有共用的「主權」，任何國家只能在其中從事合法的行為，一旦涉及非法，或不為法律所容許的行動，便會立即受到國際公約所懲罰，任何國家都有權維護公海的公共利益。像這次日本的核廢水事件，便是公然在公海搞破壞，造成海洋公益損害，無異於犯下「侵略」公海的嚴重罪行。

今次日本之所以膽敢傾倒核廢水入海，是因為它深知只要美國不追究，核廢水事件便會得到其他西方國家的包容。哪怕全球有七成國家表示反對，也都拿日本沒辦法，更不可能拿日本當「侵略國」來論。可是，在美國等西方勢力護航下，日本的核廢水事件是否便不了了之了呢？這就要看國際輿論如何認識這次事件的「侵略」本質了。

在西方媒體操縱大多數輿論的不利情況下，讓盡可能多的國家發聲的地方便是聯合國了。儘管美英可利用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來阻止任何有關懲罰日本的動議，但是世界多數成員國大可利用聯合國大會公開討論日本這次的核廢水事件，還可以藉此機會動議制訂新的海洋法例，防範類似日本這樣的破壞公海的行為。只要處理得當，西方國家與日本是無法壟斷聯合國的。

美阻李家超出席APEC峰會自毀公信

何子文

港事銳評

2023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於11月在美國三藩市舉行。香港是APEC成員之一，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理所當然獲邀參與。然而，美國4名民主黨及共和黨議員竟去信國務卿布林肯，要求華府不要邀請李家超出席會議。他們更稱，「獲悉華府計劃豁免對李家超制裁，允許他入境美國出席APEC峰會，感到非常沮喪」。APEC峰會是一個國際平台，不是某些國家的「私人俱樂部」，各成員代表都是平等參與其中，美國並沒有權力，更沒有理由阻止香港行政長官出席，這將嚴重違背APEC的定位和宗旨，更會損害區內的經貿合作和發展。美國如果繼續損人不利己的行徑，必將自毀其公信力，最終自食其果。

主辦方須確保各成員代表順利參與

對於美國個別反華政客的無理刁難，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時指，亞太經合組織辦會有其組織規則，東道主有責任確保各成員代表順利參與。今年APEC東道主美國承諾將履行東道主職責，遵守APEC相關規則和程序，為APEC成員代表赴美參會提供便利。李家超亦表示，亞太經合組織不隸屬於某一個國家或經濟體，任何主辦方都要按照組織規則及習慣邀請成員出席會議。中方的立場明確傳達了兩個信息：

一是美國是這次峰會的主辦方，主辦方的責任就是為所有成員代表與會提供便利，確保所有代表都能順利參與會議。現在有美國政客竟然要求美國政府拒絕香港代表出席，將完全違背主辦方的責任。事實上，APEC會議過去曾有與會代表因為政治原因而拒絕出席，但從未聽過有主辦方因為政治原因而拒絕與會者出席。例如1993年在美国華盛頓州西雅圖舉行的APEC領導人會議，時任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穆罕默德，因不滿克林頓對東亞經濟核心組織的立場「還不明確」，因而拒絕出席會議，當時美國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羅德還對此表示遺憾。由此可見，確保所有與會代表順利參與，是主辦方的職責，做不到就是失職，因為政治原因而拒絕代表參會，更是不得人心。

APEC是國際組織拒絕政治操弄

二是表明APEC不隸屬於某一個國家或經濟體，

更不是個別國家可以獨行其是、發號施令的地方。APEC是一個國際組織，本身是為了促進亞太區內的經濟發展、貿易、投資而設的合作論壇，這是一個經貿組織，也是一個非政治性的組織，更是一個平等的國際組織，其運作是通過非約束性的承諾與成員的自願開展，強調開放對話及平等尊重各成員意見，不同於其他經由條約確立的政府間組織。

在這樣的組織結構下，已經清楚表明APEC不隸屬於某一個國家或經濟體，所有成員都必須平等地按照組織規則辦事。峰會的主持不過是在APEC相關規則和程序下安排會議，為成員代表參加會議提供所需的便利。美國這次的角色不過是主持人，不是峰會主席，不具有對組織或會議的控制權和話語權，更沒有資格判定哪些代表可與會，哪些不可與會。美國政府如果聽從一些反華政客的要求，以政治原因阻止與會代表出席，將與APEC的設立原意背道而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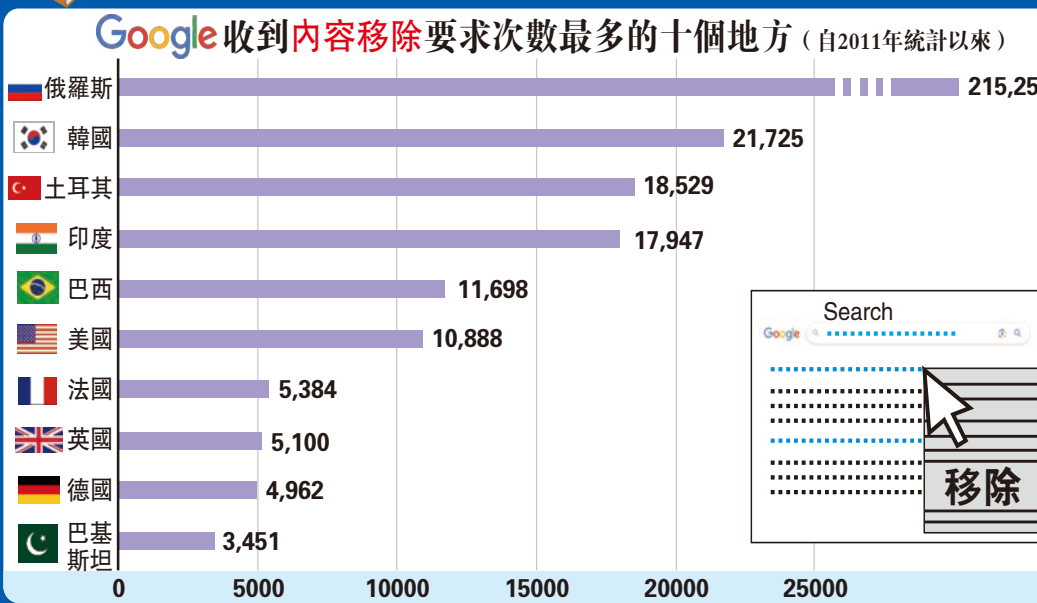
西方反華政客製造對立不得人心

當前世界各國都在尋求疫後復蘇，深化國際經貿合作，符合各國利益，不應受到政治干擾。然而，一些美國反華政客卻逆時而動，一直千方百計製造對立，挑動分歧，干預國際經貿合作，在APEC峰會上不斷搞損人不利己的小動作。就如去年11月在曼谷舉行的APEC峰會，當時美國以及一些西方反華政客同樣不斷造勢施壓，要求泰國政府不讓李家超出席，結果泰國首相巴育、印尼總統維多多、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越南國家主席阮春福分別進行雙邊會面。

美若執迷不悟必自取其辱

泰國政府沒有理會這些政客的要求，一方面在於美國對李家超所謂的「制裁」，只是美國自身的政治行為，並非聯合國安理會所作出的國際認可制裁措施，另一方面更在於APEC作為國際經貿組織，應該聚焦於區內的經濟發展，而不是被一些政治雜音干擾。美國這次如果執迷不悟，不讓李家超出席，對李家超、對香港並沒有多大損失，破壞的將是APEC平台以及國際經貿合作，損害的是全球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美國最終也會因此失去所餘無幾的公信力，自取其辱。

各地皆有要求移除網上資訊



移除網上資訊的情況普遍，全球最大的搜尋引擎Google，於「資訊公開報告」網頁的資料顯示，由所謂專制國家，到所謂民主國家，均收到來自政府的移除內容要求。Google統計顯示，自2011年統計以來，俄羅斯累計涉及21.5萬次，韓國為2萬餘次，土耳其、印度有約1.8萬次，巴西有1.2萬次，排第六的美國有近1.1萬次，有近5000次的法國、英國、德國就分佔第七至九位。中國內地則以1255次排第二十，緊貼日本、加拿大、西班牙之後，而香港累計數字為220次。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作為Google總部所在，所收到的移除內容要求，既有來自法庭，亦有來自政府官員、警方、軍方等，但Google並無百分百遵從要求。其中，單計去年下半年，Google對於美國法庭指令的「不行動」（no action taken）比率為10%至40%，針對警方為48%，針對軍方為75%。香港方面，Google對於警方的「不行動」比率過去介乎6%至91%不等，其中最低是2019年下半年，最高是2020年上半年；至於中國內地，歷年來「不行動」比率不是99%就是100%。